

翦伯赞著

先秦史



(註三六)史記四庫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
（註三五）周穆王，雖居天子之位，號為諸
侯之所役逼，然家人無異名，負積
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自穆王，穆王之故
周人名其墓曰避責墓。」按
報王雖為天子，而實為一國之主，故

北
大
名
家
名
著
文
丛

翦伯赞著

先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史/翦伯赞著. -2 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ISBN 7-301-00522-9

I. 先… II. 翦… III. 中国-古代史-先秦时代(前 211 年)
IV. K22

书 名: 先秦史

著作责任者: 翦伯赞

责任编辑: 何瑞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0522-9/K · 003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290 千字

198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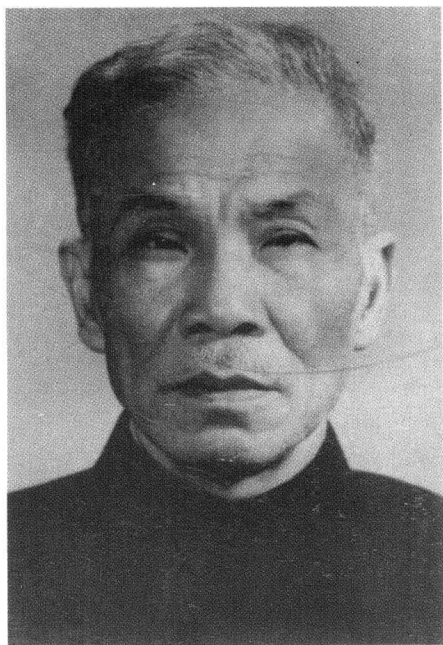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



一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始终紧密地连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北大知名学者撰写的人文社科类的学术著作，旨在反映北大几代学者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

本书获得
杨超成先生提供的出版资助
特此致谢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满族。1919年毕业于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到美国加州大学研究经济，1925年冬回国后一直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一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三届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等职。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先秦史》、《秦汉史》、《中国史科学》、《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第一辑）、《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历史问题论丛》、《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中国历史概要》（合著）等。

校 定 本 序

本书原题《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写于抗日战争中期，即一九四一年“皖南事件”之后。一九四四年四月，本书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抗战胜利后，上海生活书店又以“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种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九四七年五月两次再版。解放后，北京三联书店又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再版。关于本书的内容，翦老“自序”说：“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这次校定本书，考虑到《史纲》写作的实际情况，接受了同志们的建议，决定将本校定本改题《先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翦老的名著之一，也是他的力作之一。为撰写本书，他曾较长时期地、比较充分地做了理论和资料两方面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一九三〇年开始参加“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这项准备工作的开始。这次“论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进步知识分子与托派及部分反动知识分子之间、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等问题而开展的一场重大的思想理论斗争。翦老是革命派方面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泼辣的笔锋上阵，连续发表巨型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有《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①、《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②、《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③、《“商

① 北平《三民半月刊》五卷六期，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② 共有上、中、下三篇，分别发表于北平《三民半月刊》五卷七、八、十一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十六日、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出版。

③ 南京《劳动季报》第八期，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版。

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①等，共有十余篇，三十余万字。他在论战中所持的基本理论，后来都总结吸收到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出版的名著《历史哲学教程》^②一书中；他在论战中所探讨的主要历史问题，后来亦都总结吸收到本书和其他有关著作中。因此，本书的体例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宏富，理论性强。

本书最主要的特点有四个：

一、基本观点：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比较严格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论述史事、评价人物的。但并不空发议论，做到史料与理论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对于旧的、传统的历史学不是一概扬弃，而是去其糟粕，继承并发扬其精华。关于此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本书的体系是社会发展史的体系：中国传统的史学基本上是信古的，是以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帝王家谱来建立其体系的。内容以称道唐、虞盛世，讴歌圣君贤相为主。“五四”以后，自资本主义史学兴起，“疑古”思潮发展，曾对传说的史观有所冲击，可是这种史观也是唯心主义的。虽把有关上古的记载归入了“神话”和“传说”，可是从此中国上古的历史就剩下了一张白纸。本书的体系不是这样，而是把从北京猿人出现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这段漫长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用了约二十六万字的篇幅，比较明确具体地概述了这段历史的基本情况，初步揭示了这段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就以上述原始社会为例，他不曾“传神书怪，捕风捉影”，而是把这段历史划分为“前氏族社会”和“氏族社会”两个时期。所谓“前氏族社会”后来多称之为“原始群”或“原始游群”，就是民族学上的“蒙昧时代”，其时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

^① 上海《世界文化》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② 长沙新知书店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版，桂林新知书店一九三九年八月修正再版。

“氏族社会”后来多称之为“氏族公社”，就是民族学上的“野蛮时代”，其时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每个时期又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书中对每个阶段的主要生产和生活特点，社会组织 and 婚姻关系，意识形态，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具体论述。^①

2. 本书对各个历史阶段的剖析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原则进行的：中国传统的史学是以记述制度和事件为主，静止地、孤立地看待问题。本书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论述，都把当时的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既把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分别论述，又把这些方面看作是不不断发展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例如在论述自商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时，都分章论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包括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社会关系，包括了阶级、等级、家庭、家族；政治状况，包括了制度、事件、重要战争等；意识诸形态，包括了宗教、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有史有论，明确具体。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与“刑”为例，在介绍了“礼”与“刑”产生发展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之后，又指出：“所谓礼者，实即等级制度的教条，亦即封建社会制度之大经大法，所以别贫富，差贵贱，明上下，正身分者也。”“所谓刑者，乃是封建领主对农民行使统治的超经济的强制之权力的表现。”^② 这是用画龙点睛的方法，揭露了当时的“礼”与“刑”的阶级本质。

3. 本书认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中国传统的史学是以历代的“圣君贤相”和“英雄豪杰”为历史的创造者和

① 今天的学术界多将旧石器时代晚期划入母系氏族公社早期阶段；将新石器时代之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划入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等划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② 见本书 348 页。

主人的。因之，史学著作虽多，几乎每部都是帝王家谱，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碑立传。本书则把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放在主要地位，同时对他们受剥削、受压迫、过着悲惨生活的处境深表同情。如论述商代的奴隶制时指出：“一般自由民则已陷于饥饿线上，而奴隶大众的生活则比牛马不如。”^① 论述春秋时期的封建领主制时指出：“春秋时代的农奴，大部分仍然生活于庄园制经济之中，也有一少部分变成了新兴商人的佃农。但他们都是在繁重的赋役榨取之下，过着饥饿的日子。”^② 书中对奴隶起义，国人暴动，农奴反叛都有较多的论述，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断革命，才使王朝不断更替，制度有所发展、更新。因此，历代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4. 本书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几千年来一直统治史坛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孤立主义的历史观是不同的。本书在每一重要历史阶段或朝代之前，都有专节论述当时的亚洲和世界形势，比较研究当时的中外社会历史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亦有专节论述当时“中国境内诸种族”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状况，以体现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各族人民是平等的，都是祖国的主人。

二、主要学术论点：本书中的重大学术问题是很多的，翦老都有自己的见解，这里不能一一评述。就其中最主要的三个论点介绍如下：

1. 关于采用安特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六个时期”的划分法问题：安特生，瑞典人，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一九一四——一九二五年在中国，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曾

① 见本书 221 页。

② 见本书 342 页。

在许多地方作过地质调查，又在河南、甘肃、青海等省作过考古发掘。仰韶文化就是他首次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安特生的工作对于中国的考古工作来说，是属于拓荒时期，除了他已发现的有限资料之外，其他能供参考者几乎没有。他当时把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个时期，即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在考古工作中随时进行分类、排队、断代、分期是十分必要的。但安氏这样的分期是否科学，有多大的稳定性，都不是当时可以做出结论来的。在当时，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采用安氏之说是一大进步。翦老说：“安氏的这种划分，至今考古学家尚没有提出新的论证，给以任何改变。因此，这种划分仍不失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一个标准。”^①可是，此后的数十年间，尤其是解放以后，考古工作有极大的发展，地下资料大量出土，新石器文化的类型划分一再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当然安氏之说也就成为旧说而无人采用了。

2. 关于夏代划入“氏族社会”晚期问题：翦老在本书中，把尧、舜、禹的所谓“禅让时代”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把夏代看作是“氏族社会”的没落和向阶级社会转化的时期。所以这样，和文献不足征，考古资料少有关系。在当时的史学界中，不少人对“夏代”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直到解放初期，郭老还说：“唐、虞禅让是原始公社制留下来的史影”，夏代也是“一些史影”。^②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尤其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发现^③，夏代作为一个王朝、作为商朝之前的一个奴隶制国家而存在，逐渐为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所承认。翦老在六十年代前期

① 见本书 78 页。

②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五月第二版第四六页、十七页。

③ 二里头文化遗址是一九五九年开始发掘的。地层堆积可分四期，第一期遗存的年代与夏纪年相当。

主编《中国史纲要》，就把“夏”列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①说明至此，翦老的观点已有改变。

3. 西周封建论：采用“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著书，尤其是撰写先秦史，几乎影响全局。因为这一论点所要解决的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界限在时间上的划分问题，所涉及的朝代不仅仅是西周，而是上起商朝，下迄秦汉，甚至到南北朝，时长约两千余年，其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与之有极密切的关系。本书把商朝后期看作是奴隶制度的没落时期，“武王伐纣”与“前徒倒戈”，不仅推翻了商王朝，也最后摧毁了存在一千余年的奴隶制度。西周王朝的建立，也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的时间。翦老把封建制度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西周到战国时期，为封建领主制度，本书题为“初期封建社会”；第二阶段是从秦朝到清朝的鸦片战争以前，为封建地主制度，亦题为“中期封建社会”和“后期封建社会”。翦老早在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即持这一观点，此后数十年间不曾改变，直到去世。“西周封建论”直到今天，还为许多史学家所坚持，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一种重要观点，是影响史学界甚大的主要学术派别之一。

三、引用考古资料：本书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中国的古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由于历史久远，文献不足，仅仅以此来说明问题是有困难的。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就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②翦老还是十分珍视这部分文化遗产的。他说：“神话与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荒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二章第一节。

② 《史记·三代世表·序》。

根据。换言之，它们都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纪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言语异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①当然为数也甚少。因此，翦老决定与慎重使用文献资料的同时，亦大胆地、科学地、充分地利用考古资料。有时还要用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资料。他说：辨伪学的发展，“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金石学的发展，“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商代器物和甲骨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新石器文化之发现，“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猿人化石及旧石器文化之发现，“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本书就是从“中国历史之出发点”述起的。翦老说：“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還元为人的历史。”^②

四、图文并茂：翦老的文章之生动，文笔之流畅，很早就为学术界所公认了。郭老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写信给翦老说：“十七日信奉到，读后甚感兴奋。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至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③这里所说的《中国史纲》就是本书。当年亦在重庆从事革命工作并熟悉此事的周宗琼同志对我说：“郭老为什么说‘朗读’《中国史纲》？就是因为写的很生动，可以朗朗成

① 见本书4页。

② 见本书6页。

③ 《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八期。

诵。”^①

翦老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在本书中收有猿人化石和古器物图片四十三张，制作了历史地图十二张，各种世系表、大事年表八张。这些图表可给读者增加一些史事的直观性和空间与时间的概念。那时的重庆，图书资料极端缺乏，编制这类的图表极不容易。翦老说：“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②其艰苦性是可以想见的。可是这样做，既弥补了同类书向来存在的无图无表这一大缺点，又加强了本书的效果。

整理本书的原则共有四条：“一，理论、观点和文风一律不作改动；二，直接、间接引用的材料一一查对；三，根据横排的要求，重新标点；四，注意改正原本中的错别衍漏文字。”保持原书的面貌。本书还有如下三点需要说明：

一、原始社会分为两大部分（前氏族社会、氏族社会）和关于新石器文化采用了安特生的“六个时期”的说法，都不做改动。由于考古工作的新成就，有些器物的解说已有变化，由此导致了原来的说法已不再成立者，酌情略删。需要增加说明者，做“补注”。

二、少数引文、资料需更换者，酌情更换。全部资料都增补出处。

三、更换了部分文物图片。所换者都为翦老撰写本书时已发表的器物图片。改绘了地图，重新编制了附表。今共有插图三十八张（其中猿人化石和古器物图片三十一张，历史地图七张），历代帝（王）系表五张。

① 周宗琼，四川人，女。抗战胜利后，周总理亲自任命她为上海大孚出版公司总经理。

② 见本书5—6页。

整理本书的主要参加者有张传玺、严文明、陈秉才、张海青、葛英会等，岳庆平、张怡青、赵思训、马洪藻、傅马利等做了部分校对和图片、地图等绘制工作。

在整理过程中，得到邓广铭和周一良两位先生的指导。

张传玺

1987年7月10日溽暑之夜，

1997年5月15日修改

序

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

秦以前的古史资料，早已随着时代之悠迈而消逝。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献之不足征。西汉初，司马迁著《史记》，亦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所以司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农以前”，皆曰“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记云”。

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

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

中国的辨伪之学，自汉唐以来，即已肇始其端绪，迄于两宋而流风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则此种学问，大为昌明。其间学者辈出，如汉之郑玄、何休，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欧阳修、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顾亭林、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同、崔述以至康有为等，他们都感到“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于是不仅对于百家不雅驯之言，加以批判；即对于圣经贤传，亦予以辨证。穷其幽隐，发其讹误，分其瑕瑜，定其真伪。“一分真伪

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又去其八九”。（张之洞《轺轩语》）自此以后，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

中国的金石之学，几乎与辨伪之学是平行的发展。自汉唐以来，中国古代器物，即间有发现。《说文》序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过在当时因罕见古物，偶有所得，辄引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惊为奇。古代的器物之开始当作学问而研究，始于北宋。当时，高原古冢，颇有发现，古代器物，出土渐多，始不以古器为神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在当时虽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但据《籀史》所载，宋代著录金文之书，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诸家之书，尚不在内。是知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亦可谓盛极一时。当时学者如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道、王俅、薛尚功、张纶、李诚之辈，或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写形制，考订名物；或训释铭文，辨证经史，其用力甚大，创获亦多。至于文字训释方面，虽亦有穿凿纰缪可讥之处，但宋人对于金石学，实有凿空之功。

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者如王昶、钱大昕、毕沅、翁方纲、陆心源、孙星衍、阮元、李宗瀚、瞿中溶、吴荣光、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等接踵辈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种之多。于是金石学遂蔚为大观。降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阴之甲骨，齐燕之陶器，敦煌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发现于近数十年间，于是金石学的范围，遂日益扩大。晚近王国维对于金石学则已开始科学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神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向之不为人所注意的铭文，遂一变而为古史之珍贵的资料。自金石学发展以后，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